

远航与开拓:晚清幼童留美计划探析

曹金祥

[摘要] 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基于对洋务人才的迫切需求,萌发了派遣学生出洋学习的想法。美国政府为了加强对中国的文化影响和商业渗透积极响应。在容闳的促动下,经曾国藩等人奏请清政府批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官派留学计划付诸实施。尽管由于诸多历史原因,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但它的实施,培养了一批近代新式人才,对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转型,进而推动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晚清;幼童留美;计划;容闳

[作者简介] 曹金祥,菏泽学院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社会科学系副主任,副研究员,山东 菏泽 274015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07)12-0158-04

始于1872年迄于1881年的晚清幼童留美计划,开近代中国官派留学之滥觞。该计划虽然中途夭折,但它培养了一批近代新式人才,对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转型,进而推动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艰难的早产:幼童留美计划的出台

(一) 计划出台的国内背景

鸦片战争以降,近代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忧患局面。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1] (P12017)},奕訢等洋务派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深谙人才匮乏之弊,培养造就洋务人才遂成为当务之急。自1862年起,洋务派先后创办了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福州船政学堂等一批新式学校。这些新式学校的创办促进了西方先进文明的传播,培养了不少了解西方的专业人才。然而,由于办学体制各异、教学内容混乱、生源素质较差等原因,这些学校的整体办学质量不能令人满意。同时,学校的洋员聘用制度也弊端丛生,并非良策。洋务派官僚意识到,只有主动派员前往西方,才可真正学到西学的精髓,一些有识之士便提出了派遣学生出洋学习的主张。

早在总理衙门成立之初,奕訢即指出:“伏思购买外国炮船,由外国派员前来教习,若各督抚处置不当,流弊原多,诚不若派员带人分往外国学习之便。”^{[2] (P32)}薛福成提出:“仿俄人国子监读书之例,招后生之敏慧者,稔适各国,习其语言文字,考其学

问机器。其杰出者,施以爵赏。”^{[3] (P23)}李鸿章也认为,派人出国学习“以理与势观之,亦为将来必有之举”,“窃谓此事若行,似不至于流弊太多”^{[4] (P18-20)}。由此可见,对洋务人才的渴求是遣童留美的主要动因,这一举措在当时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因而其本身无疑是先进的。但幼童留美“主要是迫于时势、应救亡急需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具有被迫性,并非中国的主动积极之举”。清政府“对培养留学生这样的新式人才并没有充足的心理准备”^{[5] (P146)}。因此,留美幼童的诞生又是早产的,其早产的艰难正好预兆了其日后夭折的痛苦。

(二) 计划出台的外部条件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缓和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于1867年11月,委派美国卸任驻华公使蒲安臣代表清政府赴有约各国办理交涉事务。1868年7月,蒲安臣与美国政府签定《中美续增条约》(即《蒲安臣条约》),其中第七条规定:“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等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欲入中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亦照相等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6] (P25)}这就为中国留学生的派遣提供了条约依据。

当时的美国政府对清廷派员赴美留学也非常“热情”。伊里诺斯州大学校长詹姆士曾就此事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献策,他指出:“哪一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的年轻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将由于在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的和商业

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7] (P107)} 此言非常清楚地道出了美国加强对中国进行文化影响和商业渗透的真实企图。但尽管如此,中美之间表面上的友好氛围毕竟为留学生的派遣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 容闳的开山之功

国内外客观形势的发展,使派员出洋留学成为可能,但幼童留美计划的最终促成,却是与“中国留学第一人”容闳多年的努力分不开的。

容闳在美国留学期间,深受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浸染,形成了彻底开放的中西文化观,深感“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8] (P23)}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学西”的诸多方式和途径中,最主要的途径是选择优秀青年赴美留学,造就人才。在他看来,留学教育计划“是予视为最大事业,亦报国之唯一政策”^{[8] (P23)}。

1868年,容闳谒见江苏巡抚丁日昌,劝其推行新教育制度,得到赏识,在通过丁日昌给清政府的呈文中,容闳提出了以派遣留学生为主要内容的教育计划:“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以选定120名学额以试行之。此120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30人。留学期限定为15年,学生年龄,须以12岁至14岁为度。视第一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以后永定为例,则以后每年派出此数。”^{[9] (P185)}这一方案因时任总理衙门大臣的文祥丁忧回乡而被搁置下来。

1870年6月,天津教案发生后,清政府派曾国藩、丁日昌等人前去处理,由容闳任翻译,容闳乘机向曾国藩提出他的“教育计划”,经过丁日昌的游说,曾国藩欣然同意。1871年9月3日曾国藩与李鸿章等人联衔会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酌议章程折》9月15日清政府批准了这一奏请^{[10] (P56)},下令在上海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在美国成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又称“出洋肄业局”),留学所需经费库平银120万两,“准于江海关洋税项下指拨”^{[11] (P90)}。同时任命翰林出身的陈兰彬和容闳为正副监督,负责赴美留学工作,准许在沿海各省挑选幼童。

1872年8月,经过容闳的苦心挑选和准备,第一批30名幼童由陈兰彬率领启程赴美,自此到1875年,先后有4批120名学生,全部抵美。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自费留学生,容闳为之努力了近20年的愿望终得实现。正如其本人所言:“至此,予之教育计划,方成为确为事实,将于中国两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8] (P191)}就促成幼童留

美本身而言,容闳的开山导路之功是毋庸置疑的。

二、痛苦的天折:幼童留美计划的终止

赴美的120名留学幼童,当时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10岁,他们以幼稚之年,远离父母和家,飘洋过海三万二千里,历尽艰辛,来到异国他乡,但他们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而且个个学习用功,成绩优良。“不仅西学学得神速,汉文学习也一直在教习的严格指导下进行。”^{[5] (P33)}他们因为用功过度,加之身体单薄,常常病倒。还有3人积劳成疾,客死美国。到1880年,多数小留学生已经中学毕业,许多人进入中专或其他职业学校学习,还有60多人正在读大学,詹天佑和欧阳庚已从耶鲁大学毕业。大多数人开始了专门训练,五年后将成为各种专门人才。

但是,正当幼童们学业日进,大有收获之际,清政府却于1881年暑假突然下诏,决定解散留学生事务所,撤回在美留学生。留美幼童中大多数再过一两年即可毕业,成才在望,中途荒废学业,实为可惜。容闳更为悲愤,为使留学事业不致毁于一旦,他代表幼童向清政府据理力争,又在美国四处奔走,动员各种力量力挽败局,美国许多友好人士也竭尽全力挽留,然而所有的努力最后均告徒劳。1881年7月,留美幼童分三批凄然回国,当年赴美的120名幼童,除因病因事中途撤回和这次不愿回国者共26名外,其余94人都先后回国。留美近十载、耗资数十万的幼童留学计划就此不幸夭折。

幼童留美计划功亏一篑,对当时这一震惊世界的留学事件,中外不少有识之士皆为之痛加惋惜,有些人更是愕然不解。然而,就19世纪80年代的中国来说,这一事件的发生,却又是必然的。

(一)“中学”与“西学”的严重冲突

近代以前,中国人长期奉行“华夏中心”、“天朝大国”的文化中心观,形成了牢固的“天下”观念和封闭的文化心态,统治阶级蒙昧无知,盲目自大,知识分子群体则长期陶醉在华夏文明的优越感之中,对外来异质文化表现出强烈的排斥和拒绝。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侵略的加剧和西学东渐的加快,统治阶级被迫掀起洋务运动以自救,而遣童留美正是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李鸿章曾明确指出:“挑选幼童赴美肄业,以求洋人擅长之技,而为中国自强之图。”^{[12] (P4)}因而,留学教育同其他洋务事业一样,必然要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圭臬,但这一指导思想在实际运用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西学”和“中学”的冲突。

学,剪辫入教”为口舌,将全部幼童中途撤回。

(三) 美国的排华风潮

南北战争后,美国百废待举,国内劳动力需求极大,特别是为了开发西部,迫切需要大量劳动力。华工不仅勤劳耐劳,安分守己,而且工资远低于白种人,故华工在美极受欢迎。为此,《蒲安臣条约》除了有关派遣留学生的规定外,还为华工赴美大开绿灯,到美谋生人数激增。但好景不长,随着1873年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大批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华工问题便成为美国政治中的敏感问题,种族主义者乘机掀起排华运动。1880年,中美修订《北京续修条约》,开始限制中国移民的数额。而此时,大部分幼童已中学毕业,容闳出于为国内培养军事人才的考虑,根据有关协议,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接收幼童进入“陆海军学校”学习的要求,但美国政府置协议于不顾,断然加以拒绝。出洋肄业局监督吴嘉善上书清政府,“谓学生居美已久,在理亦当招回”^{[8] (P106-107)}。国内顽固派以此为借口,强烈要求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幼童。由此可见,美国的排华风潮是幼童留美计划夭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迟到的回应:幼童留美计划的影响

留美幼童归国后,被视为“洋鬼子”和危险分子,倍受冷遇和排斥,当局每月只向他们发放俸银四两,以使解决温饱问题,原来留学章程中“俟学成回国,听候派用,分别赏顶戴官阶”的规定,则成为一纸空文。

留美幼童虽然不受清廷倚重,但他们回国后身体力行,勇于任事,在所从事的行业中崭露头角,出类拔萃,经过多年努力,最终实现了在传统社会中先卑后尊的历史转变,受到世人的瞩目,清政府也开始后悔当初的撤局之举。这迟到的回应,从一个侧面彰显了幼童留美的意义和影响。

(一) 幼童留美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幼童留美计划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现代化征程上的一次远航,是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在教育、文化领域打开窗户,走向世界,救国图强的一声号角”^{[16] (P37)}。它打破了1300年来科举取士制度的垄断地位,突破了传统教育体制的藩篱,使国内各学堂开始接受分年排课、班级授课等西方现代教育体制,促进了教育制度的近代化。此外,幼童留美在教育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等教育的微观层面为近代中国转型期的教育注入了新的血液,促使清政府在清末的教育改革中,

留美幼童在美国的几年间,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他们不仅学到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也接触了较多的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很多幼童对《四书》《五经》和儒学伦理渐失兴趣,对个人权力、自由、民主等观念却十分迷恋。在生活方式上,这些幼童也表现出明显的“西化”倾向,他们大多不愿穿中式服装,个别人甚至还剪掉了脑后的长辫子,还有一些幼童受美国宗教文化的影响,开始信奉基督教。这些变化使驻洋肄业局的官员无法接受,洋务官僚吴嘉善就指出:“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其全失爱国之心,他日纵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贻害于社会,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8] (P103-104)}。清政府更是把剪发和入教看成是对清廷和祖先的背叛,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遂决定撤回幼童。

(二) 容闳与陈兰彬等人的个人矛盾

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为容闳所首倡,这项事业花费了他的毕生心血,蕴涵着容闳革新祖国的最大希望,但容闳常年留学海外,被国人视为“洋人”,翁同龢在日记中曾说:“江苏候补容闳,号纯甫,久居美国,居然洋人矣!”^{[13] (P28)}李鸿章也认为容闳“汉文未深,又不甚知大体,亦是一病”^{[14] (P18)}。基于这种考虑,容闳仅被委以出洋肄业局的副委员,同时选派一位曾在曾国藩手下任事的翰林陈兰彬为正委员。对于这种任命,李鸿章还专门作出解释:“从前曾文正公创办之初,奏派陈荔秋(陈兰彬)、容纯甫(容闳)为正副总办,盖以容纯甫熟谙西事,才干较优;荔秋老成端谨,中学较深,欲使相济为公也。”^{[15] (P17)}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陈、容二人的搭配组合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陈兰彬饱读中学,思想相当守旧,而容闳多年接受西学,思想较为开放,二人在观念和志趣方面相差迥异,在幼童的培养目标上更是大相径庭。容闳是想通过派遣幼童出国留学,让中国学生经过美国社会环境的长期陶冶,完全接受西方文明教育,“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8] (P188)}。陈兰彬则代表清政府和洋务官僚,要求学生既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又不能脱离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轨道。二人在指导思想上的这些差别,必然导致在学生管理等方面的激烈冲突和矛盾。继陈兰彬之后继任出洋肄业局监督的区谔良、容增祥、吴嘉善等人也对幼童的美国化表示不满,清廷最终以“容闳纵恣学生荒废中

加大了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方面的教学,使教育内容和课程设置更趋多样化和实用化,从而为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二) 幼童留美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积累了宝贵经验

幼童留美的最大成就,在于开创了中国留学教育的先河,迈出了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步,此后中国学生留洋热情日渐高涨,出国留学之士源源不断,使中国传统的乡土观念受到巨大冲击,其意义十分深远。而且作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初次尝试,幼童留美计划虽然中途夭折,但它从招生办法、派遣方式、留学目标、留学期限到课程安排、经费使用、行政管理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为以后的庚款留美、留欧、留日及其他近代留学教育摸索了方法,探索了道路,提供了经验。如留欧学生派遣时,吸取幼童留美教训,留学期限大为缩短,学生年龄更加成熟,中文功底更加深厚,专业选择上也更具针对性,这也是船政学生留欧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三) 幼童留美为中国近代化造就了各种新式实用人才

中国近代化,最关键、最根本的就是要有近代化的人才。容闳策划、领导的幼童留美计划,造就了近代第一批有别于旧式士大夫的新型各类人才,他们归国后虽然最初不被清廷重用,但凭借学到的近代科学知识,很快成为洋务机构的骨干。据统计,回国的94名幼童中,从事工矿、铁路、电报业者30人,其中工矿企业负责人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局长3人;从事新式教育者5人,其中大学校长2人;从事外交、行政公务者24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外交官12人,外交次长与公使2人,外交总长1人,内阁总理1人;投身海军建设者20人,其中海军将领14人,海军元帅2人;从事商业活动者7人^{[17] (P111)}。除早亡或埋没故里者外,大都在不同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容闳看到自己培养出来的留学生,归国后身居要职,对国家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近代化起步和初步发展方面创造了辉煌的业绩,甚为欣慰。他说:“今此百十名学生,强半列身显要,名重一时。而今日政府,亦似稍醒悟,悔昔日解散留学事务所之非计。此则余所用以自慰者。”^{[8] (P110)}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大潮已汹涌澎湃,但处在晚清浓厚的封建社会氛围中,绝大多数士子仍然将参加科举考试作为进身仕途的

不二法门。留美幼童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和他们社会地位的迅速升迁,显示出新式教育的潜在力量,为传统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新的进身道路,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机遇,促使人们从千年不易的科举取士制度下解放出来,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世界、投向西方,极大地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启蒙和传播。正如李鸿章所言,幼童留美实为“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18] (P871)},是“收远大之效”^{[11] (P87)}的事业。从这个角度说,容闳倡导和实践的幼童留美计划并没有真正失败,它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 [1] 赵尔巽. 清史稿(列传): 卷198[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2]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 卷15[Q].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87
- [3] 夙麟, 王欣之. 薛福成选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 [4] 李鸿章致总署函,《海防档·机器局》(二)[Q]. (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57
- [5] 石霓. 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6] 志刚. 初使泰西纪[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 [7] 金承化. 美国侵朝史[M]. 北京: 三联书店, 1954
- [8] 容闳. 西学东渐记[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 [9] 中国史学会. 洋务运动(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 [10] 郭廷以. 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11] 陈学恂, 田正平.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Q].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
- [12] 李鸿章. 驻洋幼童匀拨经费折[A].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 卷30[Q].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5
- [13] 靳法格. 中国幼童留美史[M]. 高宗鲁, 译. 香港: 香港文艺书屋出版社, 1980
- [14] 李鸿章. 复郭筠仙星使[A].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 卷19[Q].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5
- [15] 李鸿章. 论出洋肄业学生分别撤回[A].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 卷12[Q].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5
- [16] 梁赞勋. 中国留美幼童的遗产[J]. 炎黄春秋, 2004(11).
- [17] 孙培青主编. 中国教育史[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18] 高时良.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Q].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责任编辑: 青山]